

高管究竟该不该“高薪”?

最近,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限薪令”余音未落,部分国企又因“天价薪酬”遭到口诛笔伐。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今天,企业高管的薪水更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高管究竟该不该“高薪”?有人认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一刀切,高管薪酬机制应该是跟业绩挂钩;也有人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寒冬里高薪发不得。

高管薪酬备受关注

今年年初,国泰君安去年的高薪酬福利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热议,一些高管的“天价年薪”成为争论焦点。据报道,中石油近期披露的2008年度业绩表明,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中石油2008年净利润1144.31亿元,比2007年少赚300多亿元,出现多年来业绩首次下降。但是,高管们却在2008年普遍提高了薪水。这更加引发了社会的质疑声,企业净利润下降,为何高管们的薪酬却反升了呢?

事实上,财政部早在1月13日就下发通知,要求在当前特殊的形势下,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避免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水平的差距。因此,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的做法。企业高层更应率先垂范,认真与普通员工一起共克时艰。

一位网友认为,央企高管的高薪并不是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新生现象,而是近几年来舆论的关注焦点和矛头所向,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央企高管的年薪高得不靠谱,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年薪是低是低以及高到什么程度本身没有谱。

财政部于2月份连续下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关于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评价、高管人员薪酬制订等问题做出了规范。

财政部又在近期宣布,为规范金融机构薪酬管理,财政部已于近日发出通知,规范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秩序,



平安业绩缩水,高管天价薪酬将不再。

明确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时,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90%的原则确定。

这是继财政部于2月份下发管理办法,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国再次出台政策规范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有金融企业经营效益都出现下降,因此的确有必要对高管的薪酬做出规范,薪酬必须反映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才能防止在社会中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

高管是否该拿“高薪”?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企业最高层收入与组织成员平均收入之间差距不宜超出20倍。否则就有失公平,影响企业管理效率。但是现实中许多金融企业薪酬差距早已达到数百倍甚至更高。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当下,这样的差距引发了公众更大的愤怒和不满。

当前高管薪酬引发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二是高管薪酬和一般员工之间的差距。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在不久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说,企业领导人无论是哪个性质的企业,领导薪酬都必须跟业绩挂钩。他认为,人也是有价值的,在社会上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标准,很重要的就是通过价值来衡量,价值可以综合表现一个人的能力。

“关键是你的游戏规则要透明。什么叫高,什么叫低?我认为业绩高就要高,业绩低就要低。据我了解,美国高管

有的封顶50万美元,合理不合理?说50万多了还是少了?我认为不恰当,不能一刀切。”李荣融说。

这一观点被很多人支持,有人认为,高管拿高薪,前提是业绩增长。以中海油为例,企业高管的年薪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是“天价”,但企业取得的利润要远比高管的年薪多得多。企业发展了,做大做强了,为国家上交的税收、红利都会增长,国家就可以用这些钱调节贫富差距,就有更大的财力投入民生事业。

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支持高管人员高薪的理论背后,是“高薪——高人才——高绩效”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企业、高管和其他利益共享者来说都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只有“高薪——高人才”而没有“高人才——高绩效”的实现,则会产生问题。遗憾的是,从现有研究和资料来看,高薪和高绩效之间关系并不十分确定。问题还在于,如果“为绩效付酬”是高管薪酬遵循的主要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绩效指标的设定、高管薪酬中绩效部分所占的比例以及该如何兑现和绩效挂钩的那部分奖励。与此相关的关键是,高管薪酬究竟由谁来制定,又如何来制定。

公众期待:薪酬透明化

针对公众对国有金融机构收入分配不公的批评和质疑,国有金融机构“降薪令”无疑是为了顺应民意。然而,有评论者认为,要保证“降薪令”的有效实施,应有配套的惩罚性措施,不能全靠金融机构自律。没有公平公正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降薪10%不过是个数字游戏。

因为“降薪令”仅涉及账面上看得见的高管薪酬,而从上海国资委查处的案例看,一些国企掌门人每年的花费高达数百万元,从日常的交通、住房,到高级俱乐部、出

境“考察”,全由公款买单。一些专家甚至把职务消费称为比“天价薪酬”更可怕的“黑洞”。虽然有些高管表面上降薪了,背地里利用福利、职务消费“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样的限薪没有任何效果。

新华网一网友说,单纯对国企高管“限薪”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通过“限薪”达不到让国企内全体员工的收入结构趋向合理的目的。他们减少的只是基本年薪而已,并不是实际收入,其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职务消费等各种灰色收入无法切实进行“限薪”。

一位名为白中的网友认为:只限薪酬,而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限制高管的职务消费,高管们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精明的高管可以暗度陈仓,通过职务消费增加隐形收入,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堤外损失堤内补”,我们应该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不难看出,公众在质疑高管高薪的同时传递出一种期待,那就是希望国家最大程度地将高管薪酬透明化,并建立健全全国企高管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则认为,金融高管的高薪也有合理之处:金融类本身属于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行业,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行业,他的薪酬相对会高一些,高管的薪



资料图片

酬也会相对比较高。但他也指出,企业的盈利与高管的努力有多大关系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他认为在这方面是应该有一个界限的,企业盈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和高管的努力有关系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盈利,则更多的可能是市场和政策的原因。

业内人士建议,在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方面,我们不应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薪酬的绝对数额上,更应该关注薪酬的构成,关注薪酬从方案确定到构成的阳光化,原则是要让高管的薪酬水平与他们所负的责任、所承担的风险、所做的贡献相匹配。应实行科学管理,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层层落实责任,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缜密的财务制度和高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让国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更突出的贡献。

据新华社

报道反馈

央视等百家传媒热议“新郑改名”

本报记者 余英茂

4月28日,本报特别报道刊发了特稿《新郑改名“轩辕”建议的调查》,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网、新华网、搜狐、新浪、《澳门月刊》等数百海内外知名网站纷纷转载本报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早间节目《第一时间》、《北京晨报》等传媒广泛转载评论。

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新郑改名”或“新郑改名轩辕”,找到的相关网页高达2420多篇。本报报道刊发的第二天早晨,央视2套《第一时间·马斌读报》节目在屏幕上打出了《郑州日报》的相关报样,并概述了本报的报道后,主持人马斌评论说:新郑改名“轩辕”是否值得呢?这成了最大的争议点。我知道,新郑的历史是有2700年的,如果突然消失,确实让人不太适应。虽然有一段时间国内也掀起过一股改名潮,有些确实也效果明显,但我还是觉得,就跟咱个人的名字一样,好听的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有个好名字就可以拥有一切的,归根结底,名字只是个标志。

4月30日,《北京晨报》发表署名“里工”的评论,认为“地名不是说改就改的”。评论说,按照《郑州日报》报道中有趣的说法,地名是城市的“活招牌”,名字的好坏影响城市的知名度,而提升城市知名度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为城市更名。提高知名度的好处不说也知道,事实上,改名还真有可能赔钱,如果新郑更名轩辕,其改名成本将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评论认为,新郑市政府内部对改名一事存有争论,认为改名对促进经济发展用处不大,这认识堪堪清醒;而当地学术界人士认为新郑作为轩辕黄帝故里虽然得到广泛认同,但毕竟还有争议,应该审慎处之,这种却顾狭隘地域观念的学术精神更是难得。对此,我们必须抱有敬意!

除了明确表示反对,支持新郑改名“轩辕”的人也很多。在中新网对本报报道进行的网上调查中,江苏网友留言说:“我对这个更名颇感兴趣,更名肯定是有利的,可是当地政府就是在这种犹豫中失去发展的好机会,建议抓紧时间更名。”

4月29日,《澳门月刊》、四川新闻网等传媒发表了署名“叶祝颐”的评论,认为“新郑改名轩辕可讨论,不可仓促决策”。

评论说,把新郑更名“轩辕”的新闻引起了热议,网络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批评随意更改城市地名,折腾历史文化,乱花钱纳税人的钱,这些质疑都不无道理。提出质疑可以,但应该给予其讨论空间,不能一棍子打死。

评论认为,新郑改名“轩辕”的创意也有可取之处,不失为一条具有经济与文化创意的发展点子。我们对此与其简单表态反对还不如为其提供讨论空间,小心思考求证。如果新郑有关方面真正尊重了民意,理清了城市更名活动的一些具体问题,更名能提升地方形象,吸引投资,增加旅游收入,为当地百姓带来福祉,我看舆论不妨给予理解与宽容。

本报的报道刊发后,“新郑要不要改名”再度成为本地网友的热门话题。网友“风雨石”看了郑州日报一篇文章,在大河论坛发帖,“再次呼吁新郑市改名为轩辕市或黄帝市”。数十位郑州读者致电记者,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新郑青年网友“华夏之根有熊”认为本报的报道很有价值,他在百度贴吧发帖说:“连CCTV2都报道了新郑和轩辕的关系,还有近百家主流媒体竞相报道了新郑轩辕黄帝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新郑,了解了新郑,大收获也!”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ynews.com

时政

在金融危机中寻求信仰

金融海啸不同于一般自然界的海啸,虽然没有让海浪打垮一间房子,卷走任何一个人,但它打乱了金融、经济的秩序,打垮了人们心中的信心和信任,这种后果绝不亚于自然界的海啸。

这次金融海啸中最有代表性的个案是麦道夫骗案。麦道夫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骗了几百亿美元,手段是百分之百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欺骗。以麦道夫为参照,我们再看看那些不断在电脑前面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制造泡沫的人,他们是麦道夫骗案案的翻版。与麦道夫相比,他们使用的是间接骗术。在他们的手中,没有生产一粒粮食,没有开采一滴石油,没有建设一间房子,没有为社会增加任何财富,只是在不断制造泡沫,用这些假财富换取别的国家、别的公司、别的人创造的真正的财富。这种做法的性质实际上和麦道夫是一样的,只是麦道夫的手段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而他们的骗术是间接的、遮盖的而已。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这些做法都是违背基本常识的,而恰恰是好多基本常识被社会和人们遗忘了,所以他们才能这样在欺骗,并且在长期地欺骗。在我们的市场中,还有多少个麦道夫呢?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那些直接的、间接的麦道夫还在欺骗着,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进步?

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在危机中,信心的确比资金更重要,但信心的基础是诚实、是信赖。越是处在欺骗的环境中,大家就越没有信心。试想,如果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兼职的、专职的、间接的或直接的麦道夫在欺骗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来?诚实、善良、关爱、责任……这些精神品质是全社会财富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物质财富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以持续。

精神品质是如此的重要,但在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去谈爱,强调诚实,常常会显得不现实、不实际。也确有人想利用物质世界的原则去促进精神品质的进步,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其实,物质和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规律,精神世界有精神世界的法则,如果用物质世界的手段去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就如同用尺子去量温度,也如同用温度计去称重量一样的不可能。

美国《新闻周刊》有篇专题报道,题目为“基督的末日”,文中引用了3月份公布的美国 Trinity 学院做的2008年度“美国宗教信仰调查”结果:美国公民认为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数量几乎是1990年的两倍,从8%上升到15%;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的百分比也下降了10%,从1990年的86%到现在的76%。这一现象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我认为信仰的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而金融危机则是信仰缺失的结果。现在多少宗教信仰已经堕落或迷失,失去了真正信仰的力量,也失去了当年先知们自我牺牲,追求真理的精神。但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有更多的人在危机中反思危机的根源,去寻求人类的信仰——诚实、善良、关爱、责任……即,能够团结人心、启发智慧,给人类带来和谐、安宁、和平的信仰。 潘石屹

挺虎官员复出何以让人风声鹤唳

从官方网站上一则乒乓球比赛通讯稿中,有网友发现华南虎事件中的挺虎官员朱巨龙、孙承鸾仍在领导名单之列,且“排位很靠前”。并据此怀疑二人已悄然复出。(5月4日《南方都市报》)

陕西林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是以厅党组成员身份参加的……没有官复原职一说。”这表明二人虽被免去副厅长行政职务,但仍留在厅党组织中享受副厅级待遇。

这似乎是更大一瓢冷水,原来乌纱帽还有两套,所谓的免职问责,不过是少戴了其中一顶而已,这样一来,问责意义还剩多少?对于“免职”,民众天真地认为免职就是“摘乌纱帽”,可事实一再嘲弄他们:免职不是这样理解的。

专家说,外界普遍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有误解,“免职”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处理,并非一种“处分”——这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谓“处理”,就是免掉A职然后调任B职,这种技巧已在瓮安事件、“黑砖窑”事件、三鹿事件等一系列官员复出事件中有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每次复出都会招致舆论强烈质疑与不满,但原来这都是我们对“免职”的“误解”:何曾有过问责意义上的处分,一切不过是技术意义上的处理罢了。

若免职仅是无处罚意义的处理,那么免职几无意义。免职后又轻松复出,对民众情感的伤害更严重。这种严重性在该事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诸多“带病复出”的刺激之下,公众的神经承受能力临近崩溃边缘,一场不为人关注的机关乒乓球赛上领导名单排位的风吹草动,便让他们风声鹤唳,如此高度的敏感与猜疑非常常态。

问题的解决路径有两条,一是让所有民众知悉免职非问责,让人们原有的意识转弯,一是把免职剥离技术手段,回归问责本质,与民众的理解接轨;不管哪方转弯,这弯必须要弯。同一个词,官民两种不同解读,只能引起误解与纷扰,谁都不好受。 范大中

人人都可来拜祖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河南新郑是黄帝诞生和建都之地,因此到新郑去探寻祖地并进行拜祖活动是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向往之事,尤其由于近年来举行的高规格、大规模的拜祖活动被媒体宣传介绍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但来的人虽多,却停留在低层次、缺内涵的状态:一种是原始的朝山进香式,买点香插进香炉、磕三个头;一种是看看热闹,在广场里溜一圈了事,因此当下拜祖急迫地面临着改进提高的问题。从理论上、法规上看任何一位中国公民(也可包括外籍公民)都有资格并享有尊严的进行拜祖的拜祖活动,关键是有关方面要提供相应的服务活动,如礼宾小姐引导、代购祭物、音响播放仪式、录像并制作光盘等(当然要收取相应的费用,这也符合产业化的方针)让拜祖者在精神上、心理上进行一次洗礼,也扩大了黄帝故里的影响。拜祖不是只有少数高官或受邀嘉宾的“专利”,在现代公民社会尤其是这样,主要是转变观念的问题。

祭祖地和拜祖是不需要限制时日的,一年365天,天天可为。对这样的好事希望有关方面尽快改进落实吧。 李铁城



漫画:某字遮百丑

近日湖北省透露,去年3月,武汉某交流服务中心以“考察”为名组团公款出国旅游,在外停留13天,仅用半天工作,被中央纪委通报。这个“某”字让很多网友不满。刘道伟 画

“排在榜上”与“写在脸上”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开始了。每年这个时候,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总会吸引考生和家长的目光。同时,不断有人对大学排行榜提出质疑。有人对大学排行榜的名次排列及年度变化表示不满、不解,有人对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不够科学、权威。更有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曾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排行榜存在“潜规则”。

大学的名气不是排在“榜上”,而是存在各高校学生们的“脸上”。先说在校的学生。教授们的学识是不是学富五车,研究设施是不是全国一流,且校方对学生的生活、学习、生活是否关怀备至?可以去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访一访。有的高校,老师们一谈起这些便“皱眉头”。反之,在那些有实力、有特色的大学里,一谈起这些,同学们又说又笑,满脸的自豪感。再看那些已毕业的毕业生,现在他们各自处于什么岗位,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经济状况的“隐私”,看看他们说起自己母校时脸上是一种什么表情?一所大学,究竟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名气,看她那些学生脸上的表情便可“读”出个“大致”来。

说起“写在脸上”,笔者想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这所在“大学排行榜”上并不十分靠前而又海内相当知名的大学,建校50年来,中科大一直坚持保持适度规模“不扩招”,在当今中国许多大学“攻城略地”、“校际兼并”、“专业数量膨胀”的时代大背景下,这对于中科大这样一所国内知名大学来说,却显得有些“小”的味道。再说,曾经是中科大2002级学生的李某,当时家境贫寒,父母务农,爷爷患病,还有一个正读高中的弟弟。进入大学后,她看到班上还有比自己生活更困难的同学,就放弃了补助申请,每月靠一笔不多的国家助学贷款艰难地维持着生活。让她想不到的是,她一个月在食堂就餐就消费88元,令人难以置信地只消费了51.9元。这是咋回事?原来,中科大学生处正是通过分析“校园一卡通”网络系统上统计的消费数据,得知李某平时的生活十分节俭的真实情况后,及时将李某“补入”学校救助的名单中,并“偷偷地”往这位“小李同学”的“一卡通”里打钱进去。这种网络化的“不事张扬”,既能较为准确地认定谁是真正的贫困生,并实实在在地对其进行资助,也维护了学生不愿公开自己经济状况的“隐私权”,这又有了一种“躲”的味道。也正是这所“小而躲”的中科大,建校50年来,培养了42名两院院士、20多名国防科技拔尖的将军,本科毕业生中平均每千人中产生1名院士和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高居全国高校第一。可以想像,中科大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提起他们的母校,一个个脸上能不露出牛气么!

学生是大学的“产品”。一所大学名气有多大,光是争着“上榜”而“产品”在市场上滞销,这样的“大学排行榜”不如不上,即便上了“靠前,再靠前”也只能是“自欺欺人”。 张传发